

Self-Governance and Extensive Order

自主治理与 扩展秩序

对话奥斯特罗姆

朱宪辰 主编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Self-Governance and Extensive Order

自主治理与 扩展秩序

对话奥斯特罗姆

朱宪辰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自主治理与扩展秩序：对话奥斯特罗姆 / 朱宪辰
主编 .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 7
ISBN 978 - 7 - 308 - 10198 - 1

I. ①自… II. ①朱… III. ①行政管理 - 案例
IV. ①D0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44872 号

自主治理与扩展秩序：对话奥斯特罗姆
朱宪辰 主编

责任编辑 赵 琼
装帧设计 王小阳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北京京鲁创业科贸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640mm × 960mm 1/16
印 张 36.25
字 数 471 千
版 印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308 - 10198 - 1
定 价 7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 88925591

自主治理与扩展秩序

对话奥斯特罗姆



启真馆出品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序 对奥斯特罗姆自主治理理论的理解

从 1999 年开始，毛寿龙、陈幽泓等老师就把奥斯特罗姆夫妇的理论引入到中国大陆了¹，十多年来，“自主治理，多中心与发展”的概念基本上已为国内行政学界及公共经济学领域学人所熟知。在此理论的影响下，大陆的行政管理学和经济学学科领域开展了许多探索在中国转型背景下个体间合作治理与信任问题的研究，积累了不少成果。2011 年 5 月的“自主治理，多中心与发展：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学术报告会”就是这些成果的一次交流。

2009 年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所带动的关注热潮已经被后两届覆盖了，但是，奥斯特罗姆夫妇要探究的对象、问题和方法的框架——“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元理论框架”，可以说是延续、吸纳综合了哈耶克、泽尔腾、布坎南、诺斯和弗农·史密斯的思想或方法，所以，基于个体间合作治理与信任的制度研究和共享自然资源如何持续的研究，跨度大、范围广，涉及的理论任务艰巨、

¹ 1999 年 6 月，毛寿龙翻译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的《复合共同制的政治理论》由上海三联书店正式出版；2000 年，毛寿龙主持和翻译了“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译丛”，丛书首套的六本是：《美国公共行政的思想危机》（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以下简称《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制度激励与可持续发展》（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等）、《多中心体制与地方公共经济》（论文集）、《多中心治道与发展》（论文集）、《公共服务的制度建构》（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等）。

现实问题紧迫

面对这样的研究范畴要给出一个系统评述实非易事，笔者在这里也只能就个体分析的思路尝试给出自己三个方面的理解：考察的对象和范围，要回答的问题与分析的基本思路，整合的研究框架。

1 奥斯特罗姆理论的研究对象与范围

从通常的学科领域来看，许多人认为“自主治理，多中心与发展”是政治学和行政管理的范畴，正如毛寿龙所言，文森特的“贡献主要在政治学和行政学。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学术贡献则走向了经济学”，不过埃莉诺曾经担任的是美国政治学学会的主席。^①再具体一些，他们的学术贡献包括“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民主制行政的行政理论、多中心的秩序理论、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分析框架，公共经济理论”，关注的核心是围绕个体相互关联的共享事物（The Problem of the Commons）的自主治理。不过埃莉诺自己所关注的范围要更广，是整个社会与自然资源生态系统（social-ecological system）（Ostrom, 2007, 2009）。那么，这个广泛的考察范围与经济学科是什么关系呢？用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一位博士的话说，是在经济学之外“借鉴经济学研究成果的同时保持对经济学的对话、批评和探讨”^② 但无论如何，重要的经济学奖授予她已经不止一次了——1997 年政治经济学领域著名的“弗兰克·塞德曼奖”、2009 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所以，围绕公共物品或者说集体物品的使用及提供等个体间相互关联的共享事物的自主治理，无疑被经济学界也视为是自己的研究范畴。

^① Elinor Ostrom, Presidents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作为主席讲话的文献是 E. Ostrom, 1998, A Behavioral Approach to the Rational Choice Theory of Collective Action,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2 (1): 1 - 22.

^② 李文钊：《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之路——从公共事物的自主治理谈起》，2009，见 <http://www.iapp.ruc.edu.cn/news/detail.asp?newsid=n135909288>。

从概念上讨论政治学、行政管理与经济学等学科研究范畴的区别、交叉或重合，不是本文的任务，这里需要阐明的是“个体间相互关联的共享事物的自主治理”究竟涵盖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如何。援引瑞典皇家科学院的提名辞^①，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分析对象是“economic governance, especially the commons”，更具体的考察对象是“the commons”的“user associations”。^②

1.1 研究对象一：“the commons”，特别是小的“pool”

“the commons”指的是什么呢？经典译法是“公地”^③，面向大众媒体的翻译是“公共财产”，毛寿龙及其老师——奥斯特罗姆夫妇指的是CPRs (common pool resources)，毛寿龙将之称为公共事物（公池资源）。对于CPRs内涵，笔者的理解如下：

按照资源使用的排他性 (excludable) 和竞争性 (rivalrous) 两个维度的大致划分，无论天然还是人造的，CPRs 是非排他且竞争性的^④，之所以说大致，是因为俱乐部物品对非俱乐部成员是排他的，CPRs 对使用者 (user) 之外的人也是排他的，在排他性上与俱乐部物品如果区别开，说CPRs既排他又竞争，那又和私人物品一样了，所以只是大致的对象属性划分。奥斯特罗姆对CPRs排他性的界定，

① *Sveriges Riksbank's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in Memory of Alfred Nobel 2009*, Sveriges Riksbank, 12 October 2009, retrieved 2009-10-12.

② “user associations”是瑞典皇家科学院介绍获奖理由的用法：“Elinor Ostrom has demonstrated how common property can be successfully managed by user associations.” *Sveriges Riksbank's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in Memory of Alfred Nobel 2009*, Sveriges Riksbank, 12 October 2009, retrieved 2009-10-12.

③ 即哈丁 (Garrett Hardin) 1968年在《科学》杂志发表的“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公地悲剧”已成为中文的习惯用法。

④ 另外一种即教科书上所说的：纯私人物品既排他又具有竞争性；纯公共物品非排他且非竞争；俱乐部物品则排他而非竞争。这种两维度考察的着眼点是资源使用（消费或耗用）的情况：如果一个人先消费或耗用一定的量，其后可使用的量是否会减少——竞争与非竞争性；如果别人也来用，有没有可能被排除掉——排他与非排他性。

是从试图阻止他人使用获益，自己要花费的代价大小来衡量的。¹ 这一代价的大小又依赖于资源的物质属性，如果这种资源的规模很大或特性很复杂，那么要查找、认定并实施阻止他人使用的代价就会很昂贵。当然，要是付这个代价，还是能阻止别人使用的。

比较细致的刻画，是将排他性细分为实现排他性是个人之外的排他，还是特定群体之外的排他。私人物品实现排他性是个人的；俱乐部物品、CPRs 实现排他性是特定群体之外的。这样，CPRs 在排他性上区别于私人物品，而在竞争性上区别于俱乐部物品。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其经典的著作中强调的是 CPRs 的竞争性，她把描述 CPRs 为资源系统存量和该系统产生的能被提取使用的资源单位流量。流量大，就是所谓拥挤或者过度使用，别人可用的存量水平就下降了，而纯公共物品和俱乐部物品是不可能分成流量单元的，其使用也就不会导致资源总量水平下降。

作为研究对象的界定，除了明确资源——“the commons”的使用消耗性质，即 CPRs 的使用会耗费流量从而降低存量的竞争性，和排他性代价较大以外，奥斯特罗姆考察的对象一开始只限定在小型 CPRs 范围内，也就是使用者人数不多的小型“池塘”。

概括起来，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理论要研究的对象，起点（或者说着眼点）落在资源使用的物质属性，或者说资源使用的技术性特征上，包括一次一个人使用量导致存量下降（或拥挤）的属性；规模大小、使用度量的复杂程度、阻止他人使用的难度，恰好能把少量使用者与无数外人区分开。

1. 见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中译本，第 52 页。另见维基，Ostrom：“Whose size or characteristics makes it costly, but not impossible, to exclude potential beneficiaries from obtaining benefits from its use.”

1.2 研究对象二：“user associations”——使用者之间交往的行为关系

虽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把研究对象落在物质资源是枯竭还是可持续上，但考察范围必然要扩展到人对物的使用、提供等相互的关系上，或者说要从资源的物理属性转到财产权关系上，所以，CPRs 的考察范围包括制度分析与发展，奥斯特罗姆（2011）在本次会议的报告中所指出的：“CPR 作为共有产权资源（common-property resource）的含义，已被广泛使用。”奥斯特罗姆同时指出，他们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展开了针对制度的系统研究（IAD，Institutional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 的框架研究）。由此可见，对这种资源考察的范围是要延伸到产权制度安排上的。

不过，奥斯特罗姆担心“common-property resource”的“用法混淆了财产权和资源的概念”，强调要考察的不仅仅是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界定，而是实际使用行为与出钱出力维护资源存量行为之间的关系。¹ 在本书的文章中，再次强调我们考察的是当事人在田野中行使的五项权利整体的共同财产制“common property regimes”，而不是理论上假定的某一项（在共同财产制中，当事人采取他们认为正当的各种行动，或面对他们认为不正当的行为）。构成组合整体的五项权利分别是“进入权”（access）、“退出权”（withdrawal）、“管理权”（management）、“排他权”（exclusion）和“让渡权”（alienation）。

通过奥斯特罗姆对行为关系整体的共同财产制的强调，可以得出，该项研究的重要考察范围必然涵盖人们围绕物打交道的关系，而非仅仅是资源存量—流量等物的情况。这种关系，简单地说，既有别于私人个体之间的买卖交易关系，或者说不是市场关系；也有别于国家政府权力机构与居民的关系（选民与税收—财政开支的关

¹. 见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中译本，第 53 页脚注 [2]。

系，就是典型的布坎南研究的对象），所以，可以说是非市场化非行政化的第三种体制的关系，例如农会、灌溉用户合作社、互助合作金融组织这样的组织及制度。

概括起来正如奥斯特罗姆的经典著作的标题所示：“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研究对象聚焦在“the Commons”，即聚焦在 CPRs 的共同治理，或者说共同治理的集体行动上；再进一步，是这种集体行动的制度及其变化。概括起来，可以借用的词语就是“user associations”。简言之，非政府非市场的交往关系¹，或者说，国有化—私有化之外相互交往的行为方式，是研究对象的焦点所在。

1.3 扩展的研究范围：大范围的社会与自然资源生态系统

2011 年 5 月，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北京报告的主题是“Cooperating for the Public Good: Self Governance, Polycentricity & Development”，与 1990 年“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对比，研究对象依然是“物”和“人的合作”。而人的合作，大致是指在市场化个人产权交易和政府计划安排之外的集体行动、自主治理制度的形成。不过应该注意到，“Polycentricity & Development”意味着研究范围并不仅仅限于前面提到的小“池塘”。的确，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是因“基于对使用者管理的渔场、草地牧场、森林、河流及地下水流域的大量研究”，而获得了出色的研究成果。不过，在 1990 年的经典著作中，就可持续 CPRs 和组织的自主治理设计原则第八项——嵌套的分权制企业（Nested En-

¹: Elinor Ostrom (1994), “Neither Market Nor State: Governance of Common-Pool Resource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IFPRI). Lecture Series No. 2, presented June 2.

terprises），已经涉及大范围的资源系统。^① 其后，至少在 2004 年就已经与其他合作正式提出 SESs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②。以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经常引用的比较全面而有代表性的是 2007 年^③和 2009 年的关于社会—生态系统的文献。^④

从 2011 年 5 月北京报告内容来看，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扩展的研究范围在 2005 年文献^⑤中采用的是，简称为 IAD 的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元理论框架”(a meta-theoretical framework)，近期，也就是 2007 年和 2009 年，则扩展为社会—生态系统的框架 SESs。无论 IAD 的元理论框架还是 SESs，奥斯特罗姆的理论体系都是把大范围自然资源生态系统主要作为外生解释变量处理的，其聚焦依然是制度，所以 IAD 的总体框图名称就是“A Framework for Institutional Analysis”（见本书《公共物品合作供给：自发治理，多中心与发展》的图 1）；SESs 中作为“影响信任与合作行为的 broader contexts of social dilemmas”（见本书《公共物品合作供给：自发治理，多中心与发展》的图 4）。

对此需要强调三点：第一，大范围的社会与自然资源生态系统是作为被解释变量还是解释变量？显然，奥斯特罗姆主要是为了理解个体互动及产出结果，是为了揭示信任与合作行为，才扩展研究范围到自然资源生态系统（ECO）和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系统

^① Susan J. Buck (1992), “Book Reviews, E. Ostrom’s 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Natural Resources Journal*, 32 (Spring): 415–417.

^② John M. Andries, Marco A. Janssen, Elinor Ostrom (2004), “A Framework to Analyze the Robustness of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 from an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Ecology And Society*, 9 (1): 18.

^③ M. A. Janssen, J. M. Andries, E. Ostrom (2007), “Robustness of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 to Spatial and Temporal Variability”, *Society and Natural Resources*, 20: 1–16.

^④ Elinor Ostrom, et al. (2009), “A General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Sustainability of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 *Science* 325: 419–422.

^⑤ Elinor Ostrom (2005), *Understanding Institutional Diversi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第二，对引入的自然资源生态系统如何处理？奥斯特罗姆的研究，采用的是经验观察和检验的方法，所以，已经分解为若干二级指标，包括 ECO 的 ECO_1 : 气候形态， ECO_2 : 污染形态， ECO_3 : 从 SES 的流入和流出；S 的 S_1 : 经济发展， S_2 : 人口趋势， S_3 : 政治稳定性， S_4 : 政府资源政策， S_5 : 市场激励机制， S_6 : 传媒机构。第三，对个体互动微观行为基础的关注。围绕所聚焦的研究对象二——使用者之间交往的行为关系，为了考察“影响信任与合作行为的 broader contexts of social dilemmas”的因素，奥斯特罗姆夫妇早就关注个体的行为基础，例如在《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2000）中文版的序言里（第4页），奥斯特罗姆指出“需要有一个有限理性和道德行为的行为模型”，并引用演化心理学权威 Cosmides 与 Tooby 的成果：所有的个体都具有与生俱来的倾向，学习如何运用互惠和社会规则；2011年5月的北京报告（见本书《公共物品合作供给：自发治理、多中心与发展》中第4节“当前研究进展”）透露，他们正“致力于个体选择的行为理论”。所以，个体先天的学习行为、道德感，习得而形成的社会规范规则倾向和互惠决策行为等内容，在向个体行为基础的研究范围的扩展。

2 分析的问题与基本思路

虽然“自主治理、多中心”的概念在中国公共管理、行政管理领域已经耳熟能详，不过奥斯特罗姆夫妇的理论体系在若干关键点上，仍值得细致辨析。

2.1 研究的问题和任务

研究问题的提出有两种：

一是所谓政策问题，即寻求如何实现既定工程目标的技术路线：如何避免 CPRs 枯竭，是用国有化还是私有化？或是另辟蹊径？于

是，把自主治理仅仅当做前两种之外的第三种政策工具，以及不断改进政策工具，实现 CPRs 的可持续。这样提问本身隐含的意思是：存在政策工具的设计方及实施方，存在政策工具的作用对象，存在一个既定的政策推进与实施目标。当然，目标是由政策设计和实施方确定掌握的，CPRs 的使用与持续是政策方案的实施对象和结果。所以，这是社会工程系统控制的对策性质的提问。

二是，虽然对象也是 CPRs 的使用，但要回答的是初始条件、边界条件与运行状态之间如何关联，为何如此的疑问。任务是释疑，而不是实现既定目的的有效政策设计与实施。正如《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中文版译序（第 4—5 页）里表述那样：

自主组织的实例到处存在，……而没有“合适的自主组织的集体行动理论，人们既不能预见或解释在什么时候个人单靠自身的组织不能解决公共问题，也不能确定在协助解决某一特定问题时，何种干预策略可能是有效的”。

研究者面对的经验事实是：“许多针对放牧的牧民、近海捕鱼的渔民，和合伙引水灌溉的农户们开展的案例研究表明，CPRs 资源的成员能够克服社会困境——已经持续了数个世纪”（见本书《公共物品合作供给：自发治理，多中心与发展》第 2 节“问题提出”），同时，也存在大量不合作的案例。所以，需要“合适的自主组织的集体行动理论”释疑解惑，回答为什么。针对或者出现自主组织的集体行动，简称为合作；或者不合作的境况下 CPRs 枯竭；或者私有化以后资源得以持续；或者国有化以后资源获得增长。这些现实中出现的可能性，究竟为何会出现？条件、过程的机理如何？

这种提问方式，实际上与上面译序里表述略有不同，因为上面的表述容易被理解为，就是要找“有效的干预策略”，以便资源持续及增长，这就要归到第一种提问去了。现在的提问方式中，CPRs 枯

竭或增长，都是中性的，被解释变量可能产生的结果（或者是反馈过程中状态变量的取值）而已，只要有较强的解释能力（如统计检验的显著性、计量检验的鲁棒性等），虚假设被拒绝就是突破，就是进展。

奥斯特罗姆及其团队的大量工作，虽然被行政管理领域认为是公共管理政策性质的研究，也就是第一类政策对策性研究，但是，奥斯特罗姆自己的表述却偏向于第二种释疑解惑性质的研究。例如，围绕大量积累的案例，是要“辨认这些案例研究中的各种变量”(Authors tended to identify diverse variables in their studies, 见本书《公共物品合作供给：自发治理，多中心与发展》第2节“问题提出”);近期SES的“Microsituational and Broader Context”，也是为了解释相关变量对信任与合作水平的影响，为此，需要具体“辨认那些作用于个体互动和产出结果的变量”(to identify variables that may affect interactions and outcomes, 见本书《公共物品合作供给：自发治理，多中心与发展》中第4节“当前研究进展”)。

为了解答第二种问题，奥斯特罗姆为自己设定的任务极其宏大，因为是横跨许多学科的一个整合积累经验资料的框架——从IAD到SES。奥斯特罗姆指出，许多CPRs成员克服社会困境的案例来自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工程师、政治学家和人类学家。他们分别关注的是特定的资源，是在单一领域中的研究，且各研究领域的文献之间相互独立。于是，各学科独自发展导致共性成果难以积累，构建一种整合的理论和框架实在是必要的。所以，奥斯特罗姆近些年的研究任务就是以IAD为基础，构建SES框架，以便积累各学科范畴内有关CPRs成员克服社会困境案例研究的成果，以便进行更充分的经验检验。

2.2 研究的基本思路

第一，是对变量—模型功能作用的基本定位，这个定位就是理论解释模型与政策措施的区别，不能把前者当作后的工具，解释本

身，就是独立的研究目的。这在上面问题提出的部分已经给出说明。

第二，以有效政策为己任的政策设计者，存在致命的自负（自以为万能的错误自信）。奥斯特罗姆的经常被引用的话是：

完全依赖模型作为政策分析基础这一做法存在着一个认识上的陷阱，这就是学者会因此认为他们是无所不知的观察家，能够通过对系统的某些方面的规范化描述，领悟复杂的动态系统运作的真谛。有了这种自以为万能的错误自信，学者在向政府提建议时感到非常得心应手，而政府也相信学者的模型是万能的，能够纠正一切场景下存在的不完善的问题。¹

关于这一点，文森特的思考更为睿智和深邃，他引用耶鲁政治学和人类学家 James C. Scott (1998) 的名著——*Seeing Like a State*²，指出这种以有效政策为己任的政策设计者“实际上处于 Scott 所揭露的幻觉中”。如此书名所示，把国家、人民整体地拟人化，然后自己就立足于这个拟人化的位置上放眼望去，安邦定国治天下了，治理小小的 CPRs 实在是小菜一碟。文森特进而提示，这种研究定位，实际上“太容易陷入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称之为的‘体制化精神’³，把其他人视为生活之棋盘上被动的棋子，要由体系的掌管者

1. 转引自毛寿龙（2000）：《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中译本序，第 20 页。

2. 詹姆斯·斯科特（1998）：《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王晓毅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3. “把其他人视为生活之棋盘上被动的棋子，要由体系的掌管者来移动，他们则视自身为像国家自己那样观察和行动的政治家。他似乎认为他能够像用手摆布一副棋盘中的各个棋子那样非常容易地摆布偌大一个社会中的各个成员；他并没有考虑到：棋盘上的棋子除了手摆布时的作用之外，不存在别的行动原则；但是，在人类社会这个大棋盘上每个棋子都有它自己的行动原则、它完全不同于立法机关可能选用来自指导它的那种行动原则。如果这两种原则一致、行动方向也相同，人类社会这盘棋就可以顺利和谐地走下去，并且很可能是巧妙的和结局良好的。如果这两种原则彼此抵触或不一致，这盘棋就会下得很艰苦，而人类社会必然时刻处在高度的混乱之中。”见斯密《道德情操论》第 6 卷第 2 篇第 2 章“论天性致使社会团体成为我们慈善对象的次序”。

来移动，他们则视自身为像国家自己那样观察和行动的政治家。这样的幻觉又被对帝国的渴望所加强，使欧洲的主要民族深受折磨。……站在国家角度上观察和行动使欧洲人和其他民族在塑造社会生活时成为机遇和强力的牺牲者”。

“亚当·斯密在讨论人类社会的巨大棋盘时也认识到‘每个单独的棋子都有其自己的运动原则’（〔1759〕1976：381）。只有当用于确定制度安排的立法原则与推动个人行为的运动原则协调一致时，‘人类社会的博弈才能容易地且和谐地进行下去，并且很可能产生幸福和成功的结果’……‘如果这些原则是相反的或不同的，社会的博弈将悲惨地进行下去，社会必然在所有时候都处在高度的无秩序状态’（同上）。”ⁱ 借用 Scott 提出警醒的“社会工程”的概念，秉承哈耶克对社会工程的警惕，奥斯特罗姆夫妇理论的研究定位，就是以 CPRs 使用者的当地知识和他们相互间协调的潜力为模型构建和变量确定的基点，尝试竞争性的解释框架和备择假设进行检验，以实现解释理论的推进。对个体之间磨合演化潜力的敬畏，对整体秩序建构实施社会工程的警惕，可以认为大致延续了自由漠、斯密到哈耶克的思想。

此外，就理论模型与田野案例两类研究的关系而言，奥斯特罗姆夫妇工作的基本脉络是以田野案例为源头，归纳后再提出一般性假设，然后回到更大范围的田野样本中检验。同时，始终坚持解释模型是针对现实类型的抽象简化，只包括某个子变量群，但政策实施者所面对的却是某个具体的现实，而任何非控制实验的具体现实状况无法用类型抽象的模型刻画。所以，对抽象为一般的理论假设，例如，对假设命题“CPRs 成员之间面对面的交流可以提高成员个体间的合作水平”进行严格的控制实验。

ⁱ 文森特·奥斯特罗姆：“为什么二十世纪有这么多的宪政失败？”，止水译，参见 <http://www.wiapp.org/article/default.asp?id=210>